

程千帆 著

桑榆忆往

我这一生逢到的可以说是多灾多难，没有沉沦下去。这个原因，如果说得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我的个性，说到底我就是不服。受到的一切不公正的待遇都尽量地人让我写回忆录，我都没有写。这次也要使后人知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哪怕很软弱，但是又很坚强。这个传统从古代，《春秋左传》、《战国策》中记载的故事，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一直到辛亥革命，没有断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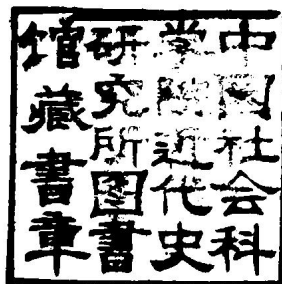
难，但不管怎么样，我冠冕堂皇一些，就深厚的感情。再就长期以来，我把所压在心里，所以别是一个机会，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春秋左传》、《战国策》中记载的故事，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一直到辛亥革命，没有断过。

白屋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程千帆 著

桑榆忆往



白屋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桑榆忆往 / 程千帆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9
(白屋丛书)
ISBN 7-5325-2767-0

I. 桑… II. 程… III. 程千帆-回忆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8580 号

白屋丛书
桑榆忆往
程千帆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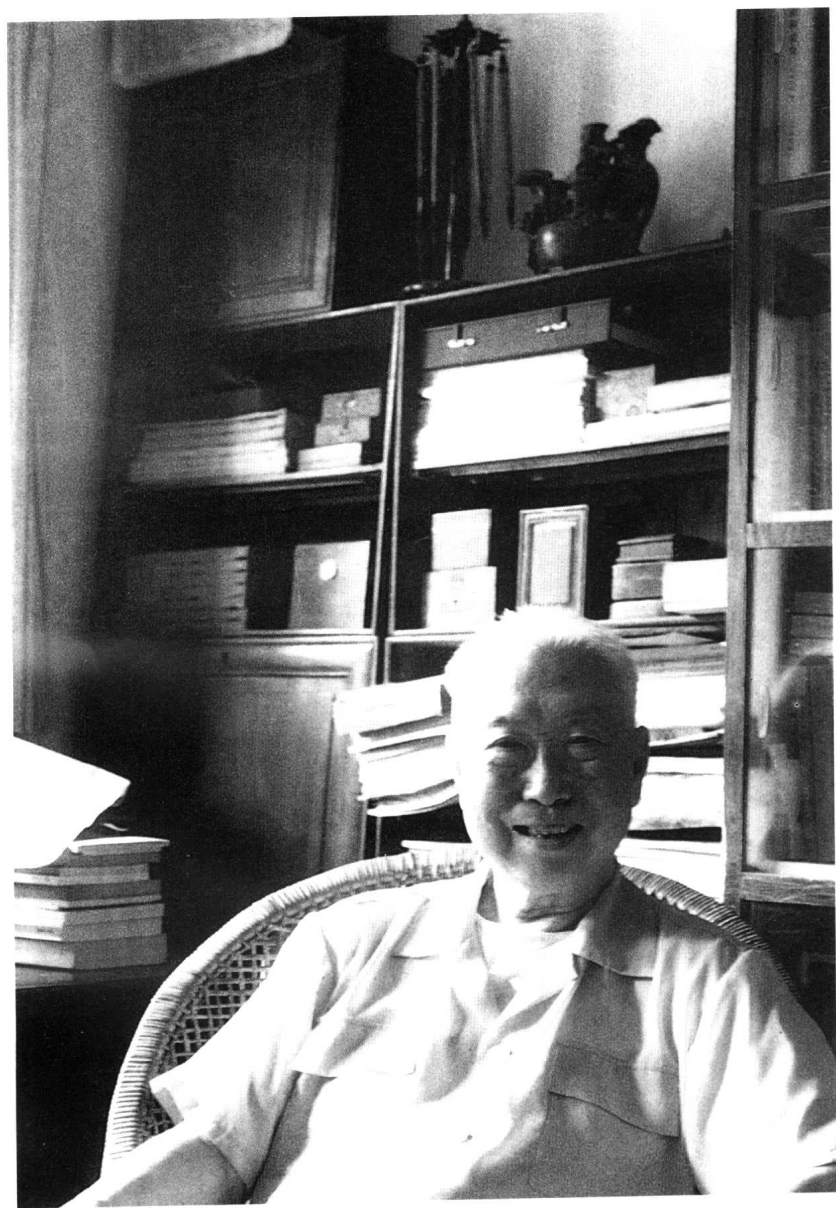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 插页 6 字数 206,000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25-2767-0

G·183 定价: 14.40 元



程千帆先生在书斋中（1988年）



在八十诞辰庆祝会上与匡亚明校长(中)、韩星臣书记(左)交谈(1992年)



向门人张伯伟叙说往事(1999年)

编者的话

在现当代的中国历史上,似乎没有另外一个词汇,比“文化”更引起人们经久不衰的注视与思索。世纪初的“五·四”运动,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六七十年代那场浩劫,则唤作“文化大革命”;到了世纪之末的今天,曾经压倒一切的“阶级斗争”等词汇渐已淡出,而“文化”则成为各行各业都想攀附的一种“热点”,似乎不如此,就跟不上时代的节律。本世纪对“文化”的这种重视,无论是深刻的还是肤浅的,也无论是建设的还是破坏的,都从不同层次反映了中国人这样一种晚来的自觉:文化问题是一切社会变迁的风信仪,而一切社会变迁,最终又必以文化的更新为鹄的。于是文化的主要承载者——文化人,他们的历史命运、行迹心路,也就成为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个越来越被人们关注的问题。

虽然文化人——在古代称作士,历来处于“当路者”与普通民众之间,成为中国社会生活、历史演进中尤其敏感而又活跃的一群,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与思想发展滞缓,他们的路向与心境倒一直比较的单纯。至少从企望为“王者师”的孟子起,他们骨子里总是以先知先觉自居,而当路者与民众也在不同程度上承认这一点。于是抱着至少是精神上的优越感,他们可以主要从书本中讨生活,以半是历史,半是心想的尧舜禹汤以来的道统,俯瞰着世俗的生活与王权,等待着当路者延为“帝师”,并

F955/c6

进而圆遂其治国济民的种种蓝图,尽管这蓝图往往被前者视为迂阔,而又为后者所漠视。犹疑与困惑也是有的,但除了忠奸真伪一类非士人独有的普遍性矛盾外,主要只是徘徊于出处之间与终极一致的学派归趋上,至于带有文化更新意义的困扰,即使有,也只是至晚明以后方以萌芽状态出现,且尚不具备动摇根本的性质。于是后来被称作“人文精神”的那种知识者的终极理念,那种不可或违的操守与对理想的九死不悔的追求,因其现实内涵的明晰,得以成功地支撑着一代又一代的士人相对平和的心境;对于所谓“虚静”的不渝强调,多少有着这种历史情境的反映。

然而二十世纪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使他们骤然震荡。一切因袭的心理矛盾,由原来偏重于谐和而趋向于尖锐对立。从学与从政,过去由“学而优则仕”相统一,现在因着专业的细化与民族的危亡,变得往往不可得兼;而在这两个层面上,过去虽有新学与旧学,新政与旧政之争,有时也形同水火,但因为归趣其实一致,即有去从,亦不妨大节,有所反复,也无伤根本。然而现在,一切新与旧的较量,却往往有了本质意义的对立。即使有幸而仍专注于学术文化的揣摩研创,但面临中国文化的巨大转型,面临他们曾倚以为生的旧文化传统的基础动摇,书斋生活也再不平静,从新从旧抑或新旧合璧的抉择,已关乎民族文化的何去何从;而一旦自觉地或者被动地卷入社会活动,从新或者从旧,也不再仅是个人进退与对一姓国家的是否忠诚,它已直接关乎亿万兆众之民族的能否生存。而这一切又都使他们必须面临这样的痛苦选择,对那曾视以为生命的一贯的节操、信念等等,究竟是应当顺应还是反叛:是幡然觉醒,成为旧世界的挑战者;还是身心分离,在感受甚至祈向着新生的同时,却无可奈何地随着旧势力的沉沦而沉沦。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的抉择痛苦,还不尽于此。由于道统观念的实际破灭,他们失去了用以傲视现实的思想依凭,却也因此有可能更脚踏实地,也更充分地发挥作为当路者与民众之交接点的职能。但是转型时期必有的种种扑朔迷离,使原本幼稚的他们常常感到前路茫茫,欲归何之:新与旧的界限并非泾渭判然,新旧之间的得失是非也非斧斫般分明。作为终极理念的“人文精神”,至此已往往因失却安放的基础而变得难以依凭。即使一旦认清了确实先进的新思想新领袖,而甘当追随左右的“革命军中马前卒”,并为他们所深深宝爱的民众沥血疆场,但由于前者在当时同样的幼稚,他们往往被拒之门外,或者进了门又被扫地出门;又由于民众思想对于精英思想的必然滞后,他们如火如荼的热忱,又常常被视为洪水猛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的望天呼吁,在当时已成为这身处于动荡时代而尚欠成熟的一群之普遍心声,在这种真诚悲壮的呼吁中,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种种矛盾,竟有了具体而微的缩影;而今天当我们返观他们的行迹心路时,也不必为其每多徬徨,时有摇摆而纳闷,因为除了少数的野心家、权谋家以及徇一己私利的叛徒走狗外,这徬徨、摇摆,正是蝉蜕鱼化时期那苦闷的象征。正是基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上述特殊地位的认识,在当今政治家、实业家的传记热中,我们设计了这一套有关文化人的回忆录丛书。

这是一套并非历史书的历史书,虽然它未有史乘的涵盖性与理论体系,但真诚的追忆所展开的生动细节,必将促使我们去思考史乘所叙述的“然”背后的“所以然”,或者这“然”是否确实“然”,从而引发我们对现有种种史学构架的审视与修正。

这又是一套并非知识读物的知识读物,由不同层次、不同经历的文化人所展开的,远比其先辈广阔的社会生活网络,将使读

者对这个部分身历而即将逝去的世纪,油然而起方方面面的真切回忆,并进而了解身边所发生的一切的种种后果前因。

自然,它们也并非是小书,但真诚与素朴永远是美文的底蕴,而文化人特有的敏感与理致,又使这套丛书,在细节的发现与心理的开掘上,更为灵动而精彩纷呈。

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人,在完成了自己当行本色的学术文化之巨大而艰难的转型同时,也参与并深刻影响了本世纪社会形态的同样巨大而艰难的转型,这二者之间究竟有何联系?而贯穿其中的文化人与当路者以及民众的历史性矛盾,又是否能给今天某些有益的启示:对于所谓“人文精神”应当如何来理解或者更新?在“造福民众”既因基本利益一致而成为真正的共同目标时,当政的文化人与在野的文化人,又如何才能更多一些相互的理解?在迎接新世纪的钟声时,我们每一个人又应当抛弃些什么,坚持并发扬些什么?等等这些问题,在审读着案头那一部部文稿时,经常在我脑海中浮现。于是,想到了一个似乎尘埋既久的名词——白屋。白屋为贫者所居,又衍而为“白屋之士”,肩负民族振兴伟业的文化人——无论是当政的还是野的,是否应当常记这与民众血肉相联的白屋呢?因取以为丛书名。

赵昌平

1999.8

题 记

本书以程千帆先生晚年回忆录为主干，取名《桑榆忆往》。全书由三部分构成：

程先生生于1913年，亲历了本世纪的许多动荡岁月，其不平坦的一生，正应了庄子所谓“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坎坷的经历可以成就一诗人，却往往难以成就一学者，“文章憎命达”所表达的无非是“诗穷而后工”。因此，当我们面对其损失了十八年黄金岁月，从八十年代以来就完成了二十多种著作时，又如何能不兴悲喜交并之情？读书诵诗，知人论世。述“劳生志略”。

三四十年代的南京和四川，聚集了不少大师宿儒，程先生或从之问学，或与之共事，名德重望，耳濡目染。昔司马越有云：“讽味遗言，不如亲承音旨。”程先生将其闻见录而为文，正可使后学“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述“音旨偶闻”。

“白头想见江南”的程先生，在晚年再度移砚南京，开始了其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既有其等身著作的次第问世，更有一批弟子在学术界的崭露头角。学生对老师的教导，信受奉行，珍同拱璧，一如子张退而“书诸绅”。兹辑录成帙，以飨同好。述“书绅杂录”。

1999年8月15日受业张伯伟谨记

目 次

题 记·····	张伯伟(1)
劳生志略 ·····	张伯伟整理(1)
一、引子 ·····	(3)
二、家世及早年求学经历 ·····	(5)
三、接受现代教育 ·····	(9)
四、四川和武汉 ·····	(17)
五、反右运动与文革 ·····	(34)
六、晚年生活 ·····	(40)
七、我的著作 ·····	(47)
音旨偶闻 ·····	(69)
忆刘永济先生 ·····	(71)
黄季刚老师逸事 ·····	(87)
我与黄季刚先生 ·····	(102)
《汪辟疆文集》后记 ·····	(111)
赵少咸先生遗著序 ·····	(118)
圭翁杂忆 ·····	(120)
王闿运与袁世凯 ·····	(123)
读《蠲戏斋诗》杂记 ·····	(125)
琐记汉寿易氏与寒家世谊 ·····	(127)

书绅杂录 (131)

书绅录..... 蒋寅、巩本栋、张伯伟记(133)

闲堂师语..... 程章灿记(164)

打好基础 拓宽视野..... 张宏生记(168)

敬业·乐群·勤奋·谦虚 巩本栋整理(177)

老学者的心声..... 程章灿整理(185)

两点论..... 张春晓整理(207)

贵在创新..... 巩本栋记(216)

附 录 (227)

程千帆先生的诗学历程..... 周勋初(229)

千帆诗学一斑..... 舒 芜(245)

程千帆先生的诗学研究..... 张伯伟(251)

劳 生 志 略

程千帆 口述 张伯伟 整理

一、引 子

有许多东西在过去来说,因为没有这些录音设备,过去也就过去了。比如李龟年的歌唱,公孙大娘的舞蹈,曾经令杜甫那样惊叹;珠帘秀这样的伶人,关汉卿这样的大艺术家,都只有一些文字上的描写记录,我们现在看不到他们的原貌了。科学的发展使许多事情成为了可能,至少谭鑫培这一代艺人的京戏我们已经听到了,也看到了,这应该说是老天爷的厚道吧。但是对于学人来说,有的人记忆力很强,所以能叙述得很有条理,我觉得胡适就有这个本事;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的一些细节也很有意思,比如说闻一多跟他开玩笑:贤者咸也,所以防闲人之多吃也。摹仿《易经》上的话,他都记得。我恐怕缺乏这样非常有连续性回忆的能力。口述的历史只是因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才成为可能,当它被人们掌握后无疑会变成史学的一个分支,而且还会壮大起来,所以口述史学是重要的。我最早看过的是丘吉尔的回忆录,他原来是一个海军世家,他的爸爸和伯父都是海军或海军史的专家,所以他的回忆录写得非常丰满,八大本,好像是商务印书馆翻译过来的。而像饶宗颐的就写得比较简单或比较概括,偏重他的汉学,他同海外汉学的接触这一方面写得比较多。

至于我个人来说,总的来讲是很简单。所以学生访问时,我说我是很简单的人。我的生平也很简单,除了晚年闯了一场祸,过了十八年不由自主的生活以外,其余都太简单了。如果要把

我的一生划成几个段落的话,也只能根据我生活的自然段落:先是很小的时候读书那一段,能够记忆的已经很少了。后来就到了南京,到大学毕业又是一段,跟着一些有学问的老师念书。这个我现在能回想起来,但具体的事实都不是很多。再后来就是抗战到胜利,我走上大学教书的岗位。然后就是解放以后这一段,就是运动。最后是到南京这一段。

我这一生逢到的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但不管怎么样,我没有沉沦下去。这个原因,如果说得冠冕堂皇一些,就是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有深厚的感情。我所接触到的各种思想,也是要用传统文化来加以衡量,也就是“批判地接受”。我对文化大革命是极端地反感,特别是一些具体的事情,真让人连哭都没法哭。你看赵少咸先生搞那个《广韵疏证》,六七十岁的人了,红卫兵把他抄了多少遍的稿子,摆在他床面前烧了。我接到殷孟伦先生这样的信,简直连哭都没法子哭。我总感觉到中华民族无权沉沦下去,如果说这个文化中没有一种真正合理的内核,她为什么亡国多少次又站起来?从小的方面说,我是感觉到我个人总可以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的,你们让我这样下去,我不服。所以这是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也是对个人的自信。

我的妻子沈祖棻出了车祸以后,女儿程丽则、女婿张威克陪我在家住了三个月。他们是工人,工厂里对他们很好,比武汉大学好多了,没有催他们。后来他们厂长自己来看了一次,我就心里有数了,让张威克先去上班,再过了一阵,程丽则也去上班了。他们上了班,第二天我就开始整理沈祖棻的诗稿,我觉得她的东西是有价值的。我一辈子对不起沈祖棻,因为她是一个应该过得好一点、舒服一点的人,可是我让她过得很苦,稍微好一点又出了车祸。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要以更多地理解她的作品作为对她的忏悔。我希望早早的硕士论文写她外婆的传记或写她的

作品分析,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表示忏悔。我后来同陶芸结婚,她最了解我对沈祖棻的感情。她一点都不嫉妒,是个好女人,很不容易。我之所以没有完全垮掉,至少还是希望把损失的时间赶回来,主要有大一点的理由和小一点的理由,那就是对传统的珍惜,有很强烈的感情;再就是我的个性,说到底我就是不服。长期以来,我把所受到的一切不公正的待遇都尽量地压在心里,所以别人让我写回忆录,我都没有写。这次是一个机会,我觉得也要使后人知道,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是那么容易被摧毁的。哪怕很软弱,但是又很坚强。这个传统从古代《春秋左传》、《战国策》中记载的故事,到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一直到辛亥革命,没有断过。

二、家世及早年求学经历

我原名逢会,改名会昌,字伯昊,四十以后,别号闲堂。千帆是我曾用过的许多笔名之一,后来就通用此名。祖籍是湖南宁乡,老家在土蛟湖竹山湾(现改属望城县),但上代已迁居长沙。我1913年9月21日(农历癸丑年八月二十一日)生于长沙清福巷本宅。

我的家境比较贫寒,没有多少物质财富,但却有一个非常丰厚的文学传统:我的曾祖父霖寿,字雨苍,有《湖天晓角词》;伯祖父颂藩,字伯翰,有《伯翰先生遗集》;叔祖父颂万,字子大,有《十发居士全集》;父亲名康,字穆庵,有《顾庐诗钞》。先父是近代著名诗人和书法家成都顾印伯先生的弟子,专攻宋诗,尤精后山。母亲姓车,名诗,字慕蕴,江西南昌人;外祖父名赓,字伯夔,侨居湖南,以书法知名当时。诗是我的家学,我幼承庭训,十二